

整合与共融：明代卫所移民“跨域”的历史实践

陈文元

摘要：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历史移民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明初移民（洪武大移民）乃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卫所移民为主轴，汉族移民乃绝对主力军。卫所移民整合的基本方式，是以卫、所为单位组织全国大量人口编充军伍，自内地向沿海，从腹地到边疆，逐步构建起凝聚与联系的网络，展现了从镇戍到嵌入、从对立到合作、从凝聚到共融的实践形态。随着时间的沉淀，源自“五湖四海”的卫所移民在各方驻地中繁衍，这场大范围且深层次的“跨域”形成了别开生面的文化多样性，开启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局面。卫所移民与各民族互化互融，呈现从内地到边疆、从区域到整体、从移民到土著的实践特点，客观上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巩固，并助推中华民族成为不可分割的坚实统一体。

关键词：明代 卫所移民 “跨域” 交往交流交融 中华民族共同体

DOI:10.13501/j.cnki.42-1328/c.2026.03.0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宋元明清时期武陵山区的国家治理与各民族国家认同研究”（23BMZ097）。

作者简介：陈文元，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教授。

基于历史移民维度观察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移民活动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也是区域性共同体形成的主要动力。”^①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交融互嵌格局经由历史沉淀与升华而来，移民运动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与巩固的重要力量。有关中国历史移民的研究成果颇丰，诸位前辈时贤或勾勒整体面貌，或梳理变迁形态，或揭示发展规律，不一而足，极大夯实和推动了移民史研究。^②这些成果为笔者开展卫所移民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关系讨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重要参考。

有关卫所移民研究，当前学界主要从军制、军户、军屯、军役与边疆治理、社会变迁等角度探讨，虽有学者不同程度涉及卫所移民与民族交融研究，^③但深入聚焦“明代卫所移民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① 谭志满、王泽泓《适应与共享：共同体视阈下武陵地区历史移民群体的在地化策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9期。

②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曹树基、吴松弟、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葛剑雄、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葛剑雄、安介生《四海同根：移民与中国传统文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冻国栋《中国人口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范玉春《移民与中国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山田贤《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等等。

③ 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奇文瑛《明代卫所归附人研究：以辽东和京畿地区卫所达官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杨洪林《历史移民与武陵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蔡亚龙《军卫牧民：明前期军民卫所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年；卢百可《屯堡人：起源、记忆、生存在中国的边疆》，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等等。

研究成果仍不为多见。明代设置了卫所制度,大量汉族移民迁入西南、西北、东北、沿海地区,构建了“大范围、广纵深、长时段”^①的移民网络结构,深入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巩固。鉴于此,笔者拟以明代卫所移民为考察对象,并结合典型案例,分析明代以卫所制度整合全国移民所引发的互嵌形式与交融历程,总结其实践特点,以期拓宽历史移民研究面向,扩充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维度,提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

一、明代卫所制度与移民“跨域”

明代以“卫”“所”为基本单位,编制全国军队及军政。“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②无论沿海与内地,腹地或边疆,皆以卫所镇戍,征调军士充任。卫所镇戍的核心宗旨是“寓兵于农,守屯结合”,即“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务尽力开垦,以足军食”。^③卫的官方全称为“某某卫指挥使司”,共有旗军(正军)5600名。“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④根据卫所性质,按地域可分为沿边、沿海、内地、在内卫所;^⑤按功能又可分为防御型、交通型、漕运型、稽查型、仪式型、护陵型卫所。^⑥另有“实土”“非实土”与“准实土”卫所之别。位于内地、沿海或设在府州县建制颇为完善地区的卫所多属“非实土卫所”,但西南、西北地区存在府州县建制不齐整、流官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因此这些区域的卫所不仅要承担监管土司、番部、“夷酋”之责,还统辖大量土地与人口,即“实土卫所”。介于二者之间即“准实土”卫所。如果某卫所又统辖民户(编民)、兼理民政(里甲),承担类似府州县职能则可称之为“军民卫所”,^⑦官方名称要再加“军民”二字。卫所制度赖以组建的基础是军户制度。明代按役分户,“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计,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得“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⑧卫所军士隶“军户”,子孙须有世代从军之人以顶军额。《明太宗实录》称,“人民不下一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⑨可见明代军户规模之巨,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5强。

设置卫所、组建军伍,并非直接将当地男丁充军,而是从外地征调,异地驻扎、跨省戍守。^⑩即将大量民众通过卫、所的形式整合,他们从原籍“解域化”,再到千里之外驻地的“再域化”,^⑪造就了大规模军事移民“跨域”,无形中构建了新型的社会关系。经明代近300年沉淀,卫所制度变迁与移民融入,其“跨域”的社会意义远超军事意义。明代大范围移民主要发生在明初,大量卫所移民迁徙是主

① 陈文元《论明代卫所制度与民族互嵌》,《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6期。

② 《明史》卷89《志第六十五·兵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75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216,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庚辰,第3184页。

④ 《明史》卷90《志第六十六·兵二卫所班军》,第2193页。

⑤ 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⑥ 陈文元《卫所文化遗产构成体系及价值辨析》,《史志学刊》2024年第1期。

⑦ “实土卫所”并不全然等同于“军民卫所”。某些卫所虽属“实土卫所”,管辖广袤土地,但并无兼理民政职权,这一情况在明代北方较为普遍。

⑧ 李善长《大明令》,明镇江府丹徒县皇明制书本,第9页b。

⑨ 《明太宗实录》卷33,永乐二年八月庚寅,第589页。

⑩ 明代为招抚、笼络西北、东北各部族,分化北元(蒙古)势力,设置了大量羁縻卫所,委任当地土酋为卫所长官,这类卫所虽名为“卫所”,但其性质实为土司、土官,所属民众自然不属本文探讨的卫所移民范畴之内。

⑪ 宋怡明《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钟逸明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第85页。

轴。按曹树基的研究,明初移民总数达11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5.7%,论及数量、程度、范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①这些卫所移民大部分来自内地省份及南、北直隶,绝大部分是汉族(也有蒙古族、回族等,但占比很小)。不同于前代军屯移民,明代卫所移民更加稳定和长期。“一经为军,他的一家系便永远世代充军,住在被指定的卫所。”^②明廷规定卫所军士需娶妻生子(军眷),正军服役还须军余在营协理当差,授予军户屯田耕种。其后筑卫城、设卫学、开驿路,加之亲友、同乡、商贾相携,经数代繁衍生息,卫所移民“跨域”后,驻地由是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汉族移民群体,正所谓“国初置卫也……夫妇二人,三世成族”。^③这些迁入的汉族移民长期与各民族频繁互动,逐渐融入地方,经过几百年沉淀,型构了现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底色。

二、明代卫所移民“跨域”的实践形态

卫所移民“跨域”之后,移民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互化互融,展现了从镇戍到嵌入、从对立到合作、从凝聚到共融的实践形态,深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基因,促进和强化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深度嵌入关系。

(一) 移民网络铺展与嵌入

自明初洪武年间全国各地卫所相应组建,征调军士充实军伍,镇守一方。譬如广西,明代共设有11卫、11所(一级守御千户所,直隶广西都司),其移民主要从南直隶、浙江、湖广等地征调而来。根据《桂林右卫选簿》显示,所载174名武官籍贯皆从外地迁徙而来,其中来自南直隶的较多,湖广亦有。^④类似,贵州卫所军士皆是洪武初年从“直隶、凤阳、湖广、浙江等处民籍三户勾解应当”。^⑤再如云南省,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廷剿灭残元势力、平定大理段氏后,置云南都司,“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⑥这些卫所移民从沿海迁徙到腹地、从内地辗转至边疆,这一短时期的大规模“跨域”调整了中国各区域人口分布,促进了人群流动与空间重组。这一情形既涉及汉族,也包括少数民族。除上述提及的西南地区外,在东南地区,明初畚族向闽东迁徙,就与卫所组建及相应的屯田活动紧密相关,部分畚族还被编入卫所军防体系当中。^⑦东北地区,明初辽东卫所移民即整合了来源不同、身份各异的群体,包括地方豪强、内地武官、归顺的少数民族首领、各地迁徙而来的军士与余丁、谪戍人士、当地的耆旧或耆老群体、诸卫所军人的眷属(大量女性)等,这些新移民与当地民众相互渗透,久之形成“我东人”的地域认同。^⑧质言之,明代卫所移民造就了中国人口流动的“大协调”与“大转换”,移民网络扩展范围大、地域广。这种移民不是区域性,而是全国性的。

①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 明时期)》,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24页。

② 吴晗《读史劄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92页。

③ (明)尹耕《塞语(不分卷)》,浙江天一阁藏本,第47页a。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8册)》,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7-244页。

⑤ 万历《贵州通志》卷20《经略志下·贵州军伍考》,《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第466页下栏a。

⑥ 《明太祖实录》卷143,洪武十五年三月丁丑,第2258页。

⑦ 刘婷玉《凤凰于飞:家族文书与畚族历史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第209页。

⑧ 杜洪涛《戍鼓烽烟:明代辽东的卫所体制与军事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80-95页。

从地理空间审视,卫所移民“跨域”分布大致呈“线性”“交错”和“环形”。其一是线性。明廷着眼于拱卫京师、防御北元(蒙古)势力,在北方布施大量卫所整合移民“跨域”,其后又组建班军,以卫所制度为基础打造“九边重镇”,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基本沿长城一线排列,既是军防前沿阵地,又是密集的汉蒙交往交流交融带,此间人口流动、经贸合作、文化互动甚为频繁;又出于控制西南的战略意图,以卫所主导湘黔滇“一线路”,依循西南一线依次向前延展。“出沅州而西,晃州即贵竹地,故清浪、镇远、偏桥诸卫旧辖湖省,故犬牙制之。其地止一线之路入滇,两岸皆苗。”^①类似线性的还有河西、辽西等地区。当然,线性的移民“跨域”形态乃是出于整体视之,实际情况远要复杂得多。其二是交错。在内地,卫所与府州县互为嵌制,军户与民户杂处。譬如潼关卫,“卫所宿者兵耳,城墉亦我幅员中地也,我民错居其中者半”。^②潼关卫初属陕西都司,后直隶明廷管辖,其名下七十屯更是分散在周边二州七县,尽显犬牙相制之意;^③而在边疆民族地区,形势更趋错综复杂,卫所、土司、府州县、“生界”犬牙交错,内外相依,竞争互构。^④譬如明代海南,弘治年间“革去土舍、峒首,立以州县屯所”,并“量拨在外军民杂处,于中开五指大路,均通往来”。^⑤所谓“军民杂处”,即黎族村寨与卫所汉族移民屯堡互为插花。也因此,卫所设置、移民屯戍“与经制州县或土司政区之间造成了彼此疆界毗邻或辖地相互插花的空间分布态势”。^⑥于微观观测,交错是卫所移民网络的基本形态。其三是环形。为防止海盗、倭寇侵扰,巩固海防,明代于漫长海岸线设置大量卫所,自东北至东南,组建了环形的海防军事体系。譬如福建省,毗邻海岸建有“五卫十二所”:分别是福宁、镇东、平海、永宁、镇海等5卫以及大金、定海、梅花、万安、莆禧、崇武、福全、金门、高浦、六鳌、铜山、玄钟等12所,沿海疆间次驻防,构成限隔山海的移民网络。

具体到地方,卫所移民经由卫城、所城,以及各类军防设施相应嵌入。^⑦为便于镇戍地方,卫所组建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城池修筑。明廷规定各地“都司并卫所城池,军马数目,必合周知”,若遇“所司移文修筑,须要奏闻,差人相度”,准令“守御军士或所在人民筑造,然后施行”。^⑧也因此,卫城、所城等地即是卫所移民聚集的核心区域。屯、堡、哨、隘、关等则围绕卫城、所城依次散布,构成了星罗棋布式的聚落。

(二) 族群关系重构与凝聚

大量卫所移民“跨域”与融入,巩固了国家统治,成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重要“无形遗产”,这一过程是从空间到时间的移易。“在增强我国各民族凝聚力的过程中,明代实行的卫所制度曾经起过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⑨明代西南、西北、岭南、东北及一些省际边区(如湖广与贵州交界地区),皆是多族群聚居之地,“苗”“瑶”“番”“夷”“仲”“蛮”分散其间,数百万卫所移民迁入,这些移民

① 王士性撰、吕景琳点校《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3页。

② 万历《华阴县志》卷1《舆地·附潼关卫》,第23页b。

③ 于志嘉《犬牙相制——以明清时代的潼关卫为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集刊(台北)》2009年第1期。

④ 陈文元《从“卫治”到“府治”——明代贵州都匀府设置始末》,《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3年第7期。

⑤ 康熙《乐会县志》卷4《艺文志》,第28页a。

⑥ 孟凡松《赋役、里甲与屯堡社区的延续性——基于清代普定县“一村多属”现象的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24年第11期。

⑦ 陈文元《从镇戍到嵌入:明末湘黔边区的卫所、军防与族群——以明刻本〈楚边图说〉六幅营哨图为考察中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⑧ 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24《城隍一·都司卫所》,万历四年重修刻本,第1页a。

⑨ 顾诚《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91页。

中绝大部分是汉族,籍贯来源复杂,各省各地皆有之,还有极小部分的“达军”“土军”“回回”“女真人”“山后人”等。^①他们奔赴万里“他乡”屯戍,与原籍渐而疏离,与驻地各族群交互,无形中改变了当地的族群结构,经年累月,先前的族群交往形态与族群关系相应重构,呈现“解域化”与“再域化”的演变历程,^②衍生了新的族群关系。

一方面,因军防而产生卫城、所城兴建、儒学传播、商贸往来,卫所移民世代繁衍,“他乡”变“故乡”,久之竟成土著,与当地非汉族群共处共融。譬如道光《贵阳府志》所称,“明设卫所……厥初调守,实五方九域之人,时移世嬗,渐同土著”,而卫所移民子弟于卫学读书,“就近乡举,久之且自忘其为他乡侨寓矣”。^③另一方面,迁入的卫所移民(包括正军、军眷、军余、余丁)聚集一卫、一所,构成凝聚核心,这些卫、所犹如星点般辐射在边疆民族地区,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明人王士性讲到,“卫所治军,郡邑治民”,其中卫所军士大多为汉族,“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民即苗也”。^④卫所移民与当地“苗”民共处一地,彼此互相依附,军民关系日益融洽。万历《贵州通志》更称“阖城老幼俱俟苗民负粟入城郭”,故“苗粟一日不至则饥”。^⑤即便是远离卫城、所城核心区域,处在郊外的各屯各堡各哨,多与周边非汉族群聚居地毗邻,经过长期相处已“交好往来”:

屯所之户,明初军籍十居其三,外来客民十居其七,今日皆成土著,与苗寨毗联,已各交好往来,睦邻之道,例所不禁。^⑥

不仅是军民之间,卫所移民群体内部不乏“汉、土结合”的情形。位于湖广西部的施州卫,乃军民卫所,其外领有大田军民千户所,处在“蛮夷之地”核心,控扼诸土司。调拨酉阳、平茶等土司“随征将卒一千一百一十名,把隘守御”。鉴于“土司乱发不常,复调本卫左所汉官兵五百五十名”,以期协同防御,共“列三十六屯,且耕且守”。^⑦明初置卫设屯,旨在守土保境、监控土司,卫所与土司是对立关系。但缓至明末,卫官和土司“媾和”,与“土官习为表里,违例结渊,深为缔好”,^⑧互结姻亲,彼此走向融合。^⑨

另外,卫所制度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局部地区族群关系转型。自明中期起,军屯废弛,卫官腐化,军士或“脱籍”或疏于操练,卫所制度日渐衰败,驻地戍守已属勉强,外出征调作战功能已然丧失。明廷不得已调整、改制卫所制度,建立省镇营兵制,负责军事征战任务。也因此,位于驻地周边的大量非汉族群通过招募和选拔进入各镇各营。譬如铜仁府之盘石营,有“仡、土、天、仲兵四百八十五名。拒各酋之咽喉,为铜右之保障”。^⑩行至万历年间,湘黔边区“辰、沅、镇筴及平、清、偏、镇诸卫延

①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参见:彭勇《明代“达官”在内地卫所的分布及其社会生活》,《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年第1期;刘灵坪《“汉”、“土”之分:明代云南的卫所土军——以大理诸卫为中心》,《历史地理》2013年第1期;宋永志《明代两广地区的达官军:以〈武职选簿〉为中心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4期;刘婷玉《明代卫所附归人家族与湖广行省回族聚居区的形成》,《民族学论丛》2023年第4期;乌云高娃《明代鞞鞞、女真卫所与东北亚驿站交通网》,《江海学刊》2019年第6期。

② 宋怡明《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钟逸明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第85页。

③ 道光《贵阳府志》卷75《明耆旧传三》,《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388页a。

④ 王士性《黔志(一卷)》,顾久《黔南丛书(第九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第9-10页。

⑤ 万历《贵州通志》卷21《秩文志一》,《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第506页下栏a。

⑥ 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6《黎平府》,道光二十七年刻本,第2-3页。

⑦ 同治《咸丰县志》卷19《艺文志》,第5页a。

⑧ 嘉靖《四川总志》卷16《经略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第321页上栏a。

⑨ 陈文元《卫所“民化”与边区治理:明代鄂西地区社会整合》,《民族学论丛》2025年第1期。

⑩ 万历《铜仁府志》卷8《兵防志·营哨》,《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第193页上栏a。

袤八百里许,营垒相望”防御之兵“汉、土、仡、苗九千六百有奇”军伍之中大量充斥着“凯兵”“仡兵”“蛮兵”“播兵”“土兵”“苗兵”^①多元族群身份交互,演化出“犬牙交错”“民苗错居”“混融共生”等地域形态与人文景观。^②也因此,明初湘黔边区由卫所汉族移民主导的族群交往局面发生转变,从“汉夷杂处”到“交融共生”。

(三) 文化习俗交织与共融

空间重组往往意味着文化的重组。大规模的卫所移民前往全国各地驻防,“跨域”对应的“人口迁移必然伴随文化传播和交流”。^③相应地,这些移民的语言、习俗、观念、饮食习惯、民俗活动也随之“跨域”进入卫所驻地,由此引发诸多层面的文化互动与互融。

其一,汉族与汉族之间。主要是指内地流官治理区域。一方面,由于同属汉族,文化差异相对较小,共同性较多,无须太多磨合便融为一体,再经时代转换,很难窥测到移民痕迹。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汉文化犹如“百味佐料”,汇聚一地传承、发展,既能很快融合,又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独具特色的汉文化区域。例如,位于东南沿海的温州,明代曾设置了温州卫、金乡卫、盘石卫,大量卫所移民从南直隶、福建及省内宁波征调而来,深刻影响了区域社会的语言与民俗。如金乡卫之金乡话、蒲壮所之瓯语方言、观海卫(属宁波府)之闽语方言。“金乡一卫,前明指挥部属居焉,初自用其乡之语,后与土语相杂成金乡语。”^④除此之外,尚有金乡卫的九月半庙会、蒲岐所的元宵灯会、蒲壮所的元宵“拔五更”、宁村所七月十五汤和节等,现今乃当地颇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⑤宁村所驻地宁村(在今温州市龙湾区)竟有91个姓氏,被誉为“中华姓氏第一村”,^⑥这自然与明代宁村所驻扎军士来自四面八方、姓氏各异密切相关,显示出典型的军事移民痕迹。以笔者田野调查经历,凡卫所驻地,村落中存在10余姓氏并不鲜见。

其二,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主要体现在边疆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地、边区。同一卫所驻地内的“汉、土”文化互动自不例外。以黔西北为例,当地卯氏家族先祖原是明初六盘山归附的蒙古人,后随军征讨,编入川滇交界的乌撒卫,遂主动学习汉文化:习汉俗、编族谱、立宗派。^⑦当然,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更多表现为卫所汉族移民与周边各民族的交流与互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譬如湘黔交界的湖广平溪卫,处“一线路”东端,“宋元以前,土彝杂处。自明开设,语言服习,大类中州”,^⑧当地风俗因大量卫所移民迁入而发生了较大转变。又如湖广西部,虽设置施州卫、永定卫以监控诸土司,但经过长时间相处,土司家族深受汉文化影响,开始学汉文、习汉俗、说汉话、取汉名,境内礼仪渐同中华,部分土司汉文化程度颇高。^⑨“卫所与土司并存,

① 吴国仕《楚边餉叙(第一册)》,万历四十五年刻本,第2页a。

② 陈文元《明代湘黔边军防空间形态演变与族群交互》,《民族学刊》2025年第1期。

③ 彭勇《明代河南的军卫移民与文化传播》,《中州学刊》2014年第7期。

④ 民国《平阳县志》卷19《风土志一》,《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第189页上栏a。

⑤ 尤育号《温州沿海卫所及其地域亚文化考察》,《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4期。

⑥ 朱永春、翁女杰《令人向往的人文乡村:为百年宁村留下百“姓”照》2024年11月29日,https://tidenews.com.cn/news.html?id=2971044&source=1,2025年5月28日。

⑦ 卯丹《从西北蒙古穆斯林到西南汉人——乌蒙高地卯氏家族历史与文化的个案分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⑧ 康熙《平溪卫志书》卷《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296页上栏b。

⑨ 陈文元《卫所移民、社会流动与民族互嵌——以湖广施州卫为考察中心》,《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实际上是同一个区域内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两种文化共存于同一个区域内,必然会发生对交流和互动。”^①在这种互动中,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接纳,体现了“少数民族在文化接触中‘兼容并蓄’的生存智慧”。^②天顺《大明一统志》亦称:“(贵州宣慰司)冠婚丧祭之礼多效慕中国。”^③类似地,远在祖国边陲的云南腾冲,明代曾设置腾冲卫,共统辖有6所。各所军士来源地各异,南直隶、湖广、山西、河南、福建等地皆有之。而腾冲所“系守御千户所改设”,军伍结构汉、土结合,“多土人”,亦间有来自南直隶、山西、陕西、湖广、四川的军士。^④这些移民为边疆民族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滇南风俗大概相同,亦与中土不异。”^⑤明初置省立卫,卫所移民自“江南徙戎者多”,故“金腾人多金陵软语,宜其风俗有吴下风荆楚岁时记也”。^⑥同样地,广西“军话”主要与明代为加强军事管制而建立的卫所制有很大关系。^⑦贵州安顺的“言旨话”、山东胶辽官话亦如是。此种情形在边疆民族地区多有佐证。

另一方面则是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卫所移民处在“四面皆夷”的地域环境中,自身力量更显弱小,很难不被众多非汉族群影响。

明代青海西宁卫陈氏家族便是典型一例。陈氏始祖陈子名,江苏淮安人,原为常遇春军中帐下小旗,后转战华北、陕甘,又参加“靖难之役”,屡立战功,授西宁卫世袭指挥使,此后不断融入地方。明末,陈氏家族与当地李氏、祁氏、赵氏、吉氏等土司家族交往密切,互结姻亲,趋向地方化。^⑧入清后,清廷直接将陈氏视为土司,令其“世袭西宁卫土司指挥使职衔”,由此完成了从卫所军户到土司家族的转变。此外,田野调查资料显示,布依族族源中有“由汉变仲”的传说。“夷族亦曰仲家”,其中“亦有原为汉人”,由各省迁徙而来的卫所移民与当地“夷女结婚,日久化为夷族者”。^⑨贵州布依族民间叙事诗《调北征南》中,同样叙述了“由汉变仲”的情况。“……开辟新山区,建造新竹楼,繁衍众子孙,扎根在贵州”,以后就“变成了夷家,变成了水户”。^⑩“水户”是布依族的另一他称。相关民间口碑资料极为丰富,譬如现今贵阳花溪的黔陶布依族苗族乡,有一村寨名曰“关口寨”,祖辈流传王姓先祖自江西跟随明代屯军来到贵州,汉族人,后来他找了4个老婆(2个汉族,1个苗族,1个布依族)。王姓先祖与汉族老婆所生的后代世居安顺,现均为汉族。而居住在关口寨的后裔则是布依族老婆所生,现在都是布依族。^⑪如今贵阳花溪的乡间尚流传有“汉父夷母”的传说。

三、明代卫所移民“跨域”的实践特点

卫所移民“跨域”全国各地,不断穿插辐射、扎根他乡,改变了驻地的人口空间形态、民族结构与聚

① 段超《元至清初汉族与土家族文化互动探析》,《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② 祁进玉、吴寒婵《西南多民族社区的文化共生机制研究——以铜鼓镇苗、侗、汉民族的文化互动为例》,《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③ 天顺《大明一统志》卷88《贵州宣慰司》,第5049页。

④ 乾隆《腾越州志》卷7《职官·武秩》,第80-81页。

⑤ 乾隆《腾越州志》卷3《风俗》,第41页上栏a。

⑥ 乾隆《腾越州志》卷3《风俗》,第41页上栏a。

⑦ 陆天桥《广西“军话”及“军人”考——明代卫所制在广西所凸显的军事地位》,《广西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⑧ 许若冰《从卫所军户到土司家族:明代西宁卫陈氏家族史实考述》,《青海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⑨ 民国《镇宁县志》卷3《民风志》,《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593页上栏a。

⑩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布依族文学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9页。

⑪ 周相卿、史炜灿《当代关口寨布依族习惯法传承与变迁问题民族志》,《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居格局,引发了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人群流动,其整合移民与移民融入的过程中,构建了超越地域、文化和语言等差异的各民族情感相亲的形态^①,深入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

(一) 从内地到边疆

明廷采取移民戍边、委任流官、授职土司等方式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与治理,大规模军事移民“跨域”至边疆民族地区,秉持“因俗而治”治理方针的同时,适时搭建起“土流并治”的统治架构,逐步改土归流,遂成整合之势。在这一整合进程中,作为卫所移民群体的绝对主体——汉族移民起到了关键作用。自秦汉以来,汉族不断发展,形成凝聚核心^②,不仅吸收其他民族加入,而且渗入其他民族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相比前代诸多批次的军屯与移民,明代卫所移民无论在迁徙地域、迁徙数量,抑或迁徙深度,均是极为显著的。

明代卫所移民迁徙线路与网络铺展大致是自内地向边疆扩散,或自东向西,或自南向北,或自北向南,从统治核心转向腹地,再从腹地转至边疆民族地区,这与传统中国构建“天下体系”的政治策略一脉相承。更为重要的是,卫所移民增进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进一步推动了“华夷一体”。现今贵州、四川等地依然流传着“调北征南”“奉旨填川”等移民历史记忆。“‘华夷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历史基础。”^③一方面,卫所移民迁入边疆民族地区,充实了人口,重组了当地族群结构,提升边疆防卫力量,巩固国防,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卫所移民虽隔万里,却依然饱含家国天下的边陲记忆,汉风、汉俗、汉字进入边疆民族地区,移民与各民族长期互动互嵌互融,无形中增强了边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

(二) 从区域到整体

卫所移民从镇戍到融入并非一步到位,这一过程颇为漫长,不同区域之间节奏不一,经历了一个从区域互融到整体互融的历史过程。首先,设置卫所制度,修筑卫城、所城,移民聚集,兴办卫学,开辟屯田,卫所驻地成为区域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中心,这方面内地卫所或许稍逊,但边疆民族地区卫所则十分突出。今天西南、西北、沿海地区的诸多市、县、镇、村治所(政府驻地),很多皆是明代卫、千户所、百户所的驻地即是明证。其次,由于军防属性,卫所驻地一般具备交通、地理、区位优势,不同程度地吸纳了商贸、邮传、物流、人口资源,使得卫所驻地往往成为区域社会人群互动与交流的核心空间,这一核心空间恰似圈层形式将周边各民族纳入进来。

以一省地域范围审视,一般而言,一省设置的卫所数量不等,少则10余卫所,多则近30个卫所(行都司),这些卫所移民经由几代人积累,人口数量尤为可观。诸卫所按照军事防卫与战略意图相应驻扎、屯垦,彼此互相呼应,构成犄角之势。再加上围绕卫城、所城分布的屯、堡、哨、隘、关、营(明后期)等军防机构,构成大大小小的社区网络“聚点”。这些“聚点”与土著居民村寨犬牙交错,构建了整体的网络框架。“这些汉族移民首先将一个边缘空间形塑为具有层次的区隔空间,然后形塑为整体性的互嵌空间。”^④由此,经过时代变迁与历史积淀,卫所移民进而开启了所驻之地新的社会关系。“他

① 励轩《各民族情感相亲的共同基础及其历史——当代关联》,《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②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③ 孔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及其文化基因》,《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④ 杨洪林《空间变迁与族际居住格局的演进——以武陵民族地区历史移民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1期。

们不是生活在大体同质的军事社群之中,而是必须融入已有的社群,和这些社群建立关系,与左邻右舍和睦共处。”^①

卫所移民带来不同的文化与技艺,改变了当地的人文环境,基于权力关系、空间拓展与经济文化转型,影响着人群互动的频度与深度。随着时间的沉淀,大大小小的“聚点”扩散、连接、组合,经过百余年磨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卫所移民日益融入当地,最终完成了从区域到整体的社会整合。

(三) 从移民到土著

明代卫所移民“跨域”的重要特点之一,即卫所移民迁徙到驻地是强制且永久的,移民规模较为稳定和长期,这些卫所移民在驻地繁衍生息,开枝散叶,其后只须保持一支子孙(通常为长房,嫡长男)世代中每代一人从军,其余宗派子孙或从事农耕,或参加科考,或转行商贾,家族家业不断扩大,所以才有夫妇二人三世成族的说法。卫所移民利用自身政治资源与社会网络,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秩序构建,与当地居民互相往来,缔结姻亲,逐渐融入当地社会,文化多样性与共性愈加突出,层层递进,渐次紧密。经过几代人的变迁,卫所移民与原籍关系日渐疏远,甚至断绝往来。卫所驻地是他们的“故乡”,千里之外的原籍“故乡”已成“祖籍”“他乡”,移民身份悄然发生转变,成为名副其实的土著。

入清后,清廷制定了卫所归并州县、改土归流、移民屯垦等相关政策,构建起一体化治理机制,更深层次推进了民族交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②与此同时,雍正朝改土归流主导了新一轮移民浪潮,但此时迁入的大量移民已是“后来”,被视为“客民”“客家”,使得先前迁入的卫所移民更被强化为土著。所以,清代诸多地方志述及明代卫所移民与屯军时,直接将其视为土著。如同治《利川县志》即称“利邑田分里、屯二籍,里田多客籍,屯田多土著。”^③从移民到土著,展现了卫所移民“跨域”三百年之后的身份转换。有趣的是,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相比于卫所移民已然完成了从移民到土著的“变奏”,先于卫所移民之前,早已在此世代聚居的“夷民”(土著),却在清中后期纷纷趋向“汉化”(有些在明中期业已开始),说汉话、习汉字、改汉名,并修撰族谱、订立字派、追溯祖先,将家族世系“包装”成帝胄名臣名将名士(他们大多是汉族)的后代,宣称的祖籍地不外乎“江西”“南京”“山西”“陕西”等地,此番反向与回流,恰似“历史的漂移”。

四、结语

移民运动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原动力。明代以卫所制度整合大量移民人口,是在总结历代中央王朝统治经验基础上所做出的政治考量与军事布局。不过,相较于以往的军屯与移民形态,由于明代军户属性与移民政策,卫所移民更为稳固、长期,由此构建了更为深层次的社会关系。更应看到,随着卫所移民“跨域”全国各地,军防拓展对应的是人口与村落的不断生成与演化,与之相伴的还有这些移民“携带”的语言、习俗、传统观念、饮食习惯、民俗活动等。丰富的文化资源源源不断地植入卫所驻地,并长久传承下来,增添了文化多样性。经过几代人沉淀,扎根于驻地的卫所移民逐渐完成空间互构,与周边人群融为一体,成为土著。明代卫所移民“跨域”促进了各民族更加广泛的交

① 宋怡明《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钟逸明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第250页。

② 杨洪林、吴文文《明清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治理机制演进——以武陵地区卫所移民为考察中心》,《江西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

③ 同治《利川县志》卷3《风俗》,《荆楚文库》,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第98页下栏b。

往交流交融,深入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与凝聚。剖析历史移民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关系,探究历史移民的内涵、特点及其规律,既可作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实证,亦可将其作为传统智慧,经提炼后致力于当代民族工作开展与民族互嵌式社区创建,对于打造新时期各民族人口流动与深度交融的“中国经验”颇为有益。

Integration and Coexistence: The “Cross-regional” Historical Practices of Weisuo Immigratio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CHEN Wenyuan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historical migration serves as an ideal point of entry. The migration during the early Ming Dynasty (known as the Great Hongwu Migration) was the largest migratory movement in ancient China, with Weisuo (garrison) migrants as its backbone and Han Chinese as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The fundamental mode of integration for Weisuo migrants involved organizing vast populations into military units based on Wei (guards) and Suo (posts). Moving from the interior to the coasts and from the heartland to the frontiers, they gradually constructed a network of cohesion and connection. This process manifested a practical evolution from garrisoning to embedding,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operation, and ultimately from cohesion to integration. Over time, the Weisuo migrants hailing from “all corners of the country” flourished in their respective garrisons. Thi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cross-regional movement sparked a unique blend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ommonality, ushering in a new era of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mong the Chinese ethnic groups. Through mutual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these migrants and the diverse local ethnicities became inextricably intertwined — a state of “you in me, and I in you”. Corresponding to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hifting from the interior to the frontiers, from the regional to the holistic, and from migrants to indigenes, this process has significantly advanced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bolstering the Chinese nation into an indivisible and solid unified entity.

Key Words: Ming dynasty; weisuo (garrisons) immigration; “cross-regional”;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责任编辑: 墨 涵